

影响

YINGXIANGXINZHONGGUO60NIAN
JINGJIJIANSHUDE
100WEIJINGJIXUEJIA

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

100位 经济学家

吴太昌 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刘伟 主编

7

影响

YINGXIANGXINZHONGGUO60NIAN

JINGJIANSHUDE

100WEI JINGJIXUEJIA

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

100位 经济学家

7

吴太昌 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刘伟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 7 / 吴太昌, 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刘伟主编.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54-0165-3

I. 影… II. ①吴…②张…③吴…④厉…⑤刘… III. ①经济学家—生平事迹—中国②经济—中国—文集 IV. K825.31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8592 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本	73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33.75 2 插页
字数	532 000 字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印数	1~3 000 册
书号	ISBN 978-7-5454-0165-3
定价	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8306107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50 邮政编码: 510075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论证及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 昉	黄 达	黄范章	贾 康	李晓西
厉以宁	林兆木	刘 伟	王 诚	王一鸣
吴太昌	吴敬琏	赵海宽	赵人伟	周叔莲
郑红亮	张问敏	张永山	张卓元	

前 言

200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我国经济学家们在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诸如人口经济理论、商品经济理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引进外资、宏观经济管理、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收入分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经济体制转型等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上，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创见和政策建议，为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宣传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贡献，并激励后学，我们特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丛书。丛书的成功出版，也是我们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一份礼物。

该丛书的出版设想最初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提出。因为早在 1998 年，该社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教授等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该丛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提名奖。弹指一挥间，很快就十年过去，并迎来了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华诞。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出版社领导萌生了再出版一套类似的

丛书的想法。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丛书的缘由。从这里也反映出了作为出版者的广东经济出版社领导的敏锐眼光。确实，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并越来越发觉到出版该丛书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本丛书选编的百位经济学家，几乎全部囊括了影响新中国六十年来经济建设的我国重量级经济学家。他们的知名度之高，使他们的名字不要说在经济学界，就是在普通的民众中，只要是比较关心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生活问题的，也是多有所闻的。因此，在这套丛书里，可以说名副其实地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间经济学界群星形象的大聚汇，也是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这对经济学家们是一个很好的表彰，对广大读者来说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了解我国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机会。

其次，本丛书中的代表作和学术简历都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或者非常了解其情况的人士选择和撰写的。这就充分地保证了本丛书内容的真实准确性和权威性。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应该是非常有史料价值的研究文献。从这些有时间顺序、时代特征和特定专题内容的文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我国六十年经济建设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线索，而且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学家探索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脉络和不懈努力。

第三，本丛书中的不少论著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细心的读者当然会从文章的内容本身或者文章的题注和文后的一些说明中看到这一点。它们有的在当时我国的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引起过激烈争鸣并产生过很大反响，有的则是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有关决策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还有的则得过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经济学大奖，甚至有的文章是这三者兼而有之。可以说，其中的很多作品，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启迪。它们是我国经济学文献库中的宝贵财富，对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献资料。

盛世出华章。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也为经济学家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要从我国众多的经济学家中推选出大家比较公认的有影响力的百位经济学家，这是个相当不容易的工作；并且在推荐出来后，要及时全面地组织到相应的入编稿件，更是一件需要持续努力和工作量很大的事情。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经商量决定由《经济研究》编辑部来具体负责本丛书的组稿和编辑加工等工作，并付诸实施。我们在制定出初步的编辑出版方案的基础上，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了小范围的专家论证会议，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由此确定了本丛书的编辑主旨、特色及经济学家的入编标准等，并初步遴选出了一批经济学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家入编候选人名单。

为了使全国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不被遗漏，使入编经济学家名单更具权威性，我们还以信函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京外共 50 余位经济学家发出了邀请，请他们来推荐认为可以入编的经济学家名单。这些积极帮助我们推荐候选人的经济学家包括（按音序排列）：陈继勇、费方域、谷书堂、何炼成、洪银兴、胡培兆、胡祖光、黄少安、黄祖辉、李炳炎、李江帆、李维安、李新春、刘少波、刘诗白、刘志彪、吕炜、毛蕴诗、逢锦聚、沈立人、史晋川、舒元、谭崇台、王珺、吴世农、夏振坤、徐传谔、姚先国、于金富、于良春、袁志刚、臧旭恒、张军、张馨、周振华、朱平芳等。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召开了本丛书的论证及编辑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按音序排列）：蔡昉、黄达、黄范章、贾康、李晓西、林兆木、刘伟、王诚、王一鸣、吴太昌、赵海宽、赵人伟、周叔莲、郑红亮、张问敏、张永山、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因故缺席。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百多位经济学家的专业特色各有不同，所属时代背景也有差异，因此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入编的主要标准。首先应明确，评选时要以改革开放以后为主，以改革开放以前为辅。其次，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学术贡献和政策影响力这两条。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委员们结合

已经遴选的经济学家入编名单和京外专家推荐的情况（如票数多少等）进行逐一论证，并以无计名投票的方式补充增加了新的入编经济学家名单，由此最终确定了入编丛书的 106 位经济学家。当然，由于时间紧等各方面的原因，确定入编的 2 位经济学家的文章最后没有能够编入本丛书，这无疑是一个缺憾。

确定入编名单以后，我们立即展开了组稿工作。我们的基本要求是：入编经济学家推荐自己的代表作 2～3 篇并撰写 1500 字左右的个人学术简历。被推荐入编的经济学家或其家属、秘书、好友等，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纷纷在百忙之中积极准备所需要的资料，认真精神令人感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这项工作是难以按时按质完成的。

在本丛书的编辑体例上，由于历史跨度大，所选文章的形式和风格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990 年代以前的文章大多采用脚注的形式，而在之后则采取了参考文献加脚注的形式。这方面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尊重历史原貌，不强求统一。另外，经济学家们的学术简历的写作风格也比较不一样。由于丛书毕竟不是辞书，所以我们也尊重各人的写作风格，不强求一致，只是个别稿件应出版社的要求，请作者作了一些局部的调整。从出版社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不足，但从风格多样化的角度看，也可能是个优点。当然，如果出版时间不是那么紧，或许这两个方面能够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经济学家的排序上，我们讨论过多种方案，如按出生年月排列，或先把经济学家按研究领域分类，然后再按某种程序排列；也曾经考虑过按照姓氏笔划排列；后经再三斟酌，同时也是根据张卓元老师的建议，我们采用了音序排列法，读者朋友们可以在时空的跳跃中，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进行心灵的沟通与思想的对话。

由于入编经济学家大多是名人、忙人，具体承担组稿工作的《经济研究》编辑部的同志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们通过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不断地与有关经济学家或其家人、秘书等

进行沟通、催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才最终完成了本丛书全部稿件的组稿工作。为了争取时间，编辑部还采取了组稿和编辑加工稿件齐头并进的办**法**，来了一批稿件，就马上安排编辑人员开始审读加工，并及时与出版社沟通，解决编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参加组稿和编辑工作的人员有：郑红亮、王诚、张永山、金成武、王利娜、詹小洪、唐寿宁、俞亚丽、欧宏、王红梅。

广东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在本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姚丹林社长等社领导曾几次来京与我们商量有关出版事宜。收到稿件以后，他们及时组织了社里的编辑人员集中审稿，并多次通过电话与我们讨论沟通，以使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更加完美。他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称道。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

论证及编辑委员会

2009 年 8 月

目 录

吴树青	1
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	4
两种改革 两种结果	15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	23
吴晓灵	35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几点意见	38
积极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	42
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	53
中国国有经济债务重组问题	63
萧灼基	73
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	76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92
谢平	111
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	114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争论	129
许涤新	147
实现四化与生态经济学	150
关于人口科学的几个问题	157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	168

《广义政治经济学》序言	177
许毅	181
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	185
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历史使命	200
论三农问题与农业生产方式革命	217
薛暮桥	233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236
经济工作必须掌握经济发展规律	253
严中平	271
关于洋务派举办新式民用企业的评价问题	274
《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 ~ 1894》	288
杨坚白	303
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同异辨	307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339
易 纲	36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演变	364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内在逻辑	384
于光远	405
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	409
对改革中国家所有制的命运和企业所有制的发展前途的思考	413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个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428

余永定 447

通过加总推出的总供给曲线 450

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 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 470

袁志刚 487

现代服务业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490

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表现与走势 498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516

吴 树 青

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
两种改革 两种结果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

吴树青，1932 年 1 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49 年 5 月进入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随即被分配到中共浙江省桐乡县委工作。1952 年被抽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习。1955 年夏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职务。1984 年起先后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教务长、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1989 年夏经中央决定，调北京大学任校长。1996 年离任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吴树青当选为党的十四大代表和第八、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担任的社会职务主要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理论经济学学科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经济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等。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吴树青因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思潮持有不同看法而遭到批判，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权利。他利用这个非常时期，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一些经济学名著，为后来的发展进行了理论和知识的储备。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吴树青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之中，是比较早论证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学者之一，他撰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因、内涵和特征以及应当采取的政策等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获 1988 年中宣部优秀论文奖。吴树青也是比较早提出必须区分两种改革观的学者之一。在改革问题上，既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又鲜明地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他提出稳中求进的思路，认为在改革的方

法步骤上，既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又不能脱离实际的可能，轻言闯关，操之过急。他主持完成的《1988年至199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他对不同社会制度下商品经济的共性和个性的分析，对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分析，都得到了好评。特别是他对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的分析，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深刻分析了坚持公有制主体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困难的成因，划清了调整所有制结构同私有化的界限，获得了1994年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论文奖，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受教育部的委托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突破了传统教材的体系，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的运动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新的教材体系，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被广泛采用，1997年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除了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外，吴树青还先后担任中宣部、教育部和北京市组织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理论概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教材的主编。这些教材分别被教育部和北京市评为优秀教材。他还获得北京市委颁发的首都精神文明奖章和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吴树青学风严谨、作风朴实，他的学术风格是求实、求深，始终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力求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他既不追求标新立异，也不随波逐流，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他鼓励他的学生独立思考，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要敢于提出与他不同的见解。

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

60 年代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这样一种看法，几乎已经成了定论。近年来，有些同志对这种看法提出了疑义，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应该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依次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任务，把“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混为一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另一些同志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把“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割裂开来，理论上违背了马列的观点，实践上会导致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重蹈“全民国家”的覆辙。这一争论，涉及到应当怎样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确实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关于过渡时期的问题，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来的。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关于“自由国家”的错误口号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探讨过渡时期的含义，首先就涉及到应当怎样理解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一词的内容问题。有些同志认为，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因此，过渡时期当然是指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期，所以它应当包括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内。这种论证方法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使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时，同我们今天习惯的用法不同。我们今天讲共产主义社会，总是专指它的高级阶段而言，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较多的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它。这是因为，在马克思

〔1〕《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43 页。

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所谓社会主义者，通常是指那些信奉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能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消除一切社会弊端。这种社会主义，同真正的工人运动毫不相干。工人阶级中那些主张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都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而当马克思使用“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名称时，指的却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而不是专指它的高级阶段。我们看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学说，但却一次也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用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以此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相区别。因此，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指的是它的高级阶段还是低级阶段，仅就字面来说，是无法作出肯定的判断的，必须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学说作一番考察。

马克思是根据什么和为什么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学说的呢？对于这一点，列宁有过十分精辟的说明。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时指出：“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1〕列宁还说，马克思不像过去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在头脑中去为未来社会详尽周密地描制蓝图，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2〕其所以能够作出这种确定，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新社会。根据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在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新社会，并不可能立刻就从各个方面完全消灭了一切旧痕迹。因此，在这个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所以，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新社会的第一阶段时明确指出：“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

〔1〕《列宁选集》第3卷，第243页。

〔2〕《列宁选集》第3卷，第249页。